

陈思和 著

# 中国新文学

上 海 文 艺 学 术 文 库

## 整体观

ZhongguoXinwenxue  
Zhengtiguan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 海 文 艺 学 术 文 库

陈思和著

#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

Zhongguo Xinwenxue

Zhengtiguān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爱莲

封面设计：周志武

上海文艺学术文库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

陈思和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i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298,000

1987年6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2版 2001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5,601—9,100册

ISBN 7-5321-0209-2/1·164 定价：22.00元

## 出版说明

近二十年来,上海文艺出版社凭借自身的出版优势,富有创意地编辑出版了大量人文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在读书界、学术界、出版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这些著作出版时间较早,近年亦很少重印,所以现在读者很难见到了。有鉴于此,本社决定推出一套“上海文艺学术文库”。

“文库”主要从本社出版的学术著作中精选最具原创性、最富前瞻意义的优秀著作,同时也适当选收一些虽非本社原版、但与本社出书风格比较接近的学术著作。

“文库”将分辑出版。每本著作均由专家学者撰写学术性的导读文章,对其内容作出具体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

学术的研究和文化的传播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和广大热心者的恒久努力。我们希望,我们这项出版工作能够得到读书界、学术界、出版界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营造学术氛围,传播文化知识的路途上,请让我们携手共进。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年12月

## 序

郜元宝

陈思和师每本新书出来，都认真签好名送我。他是我本科班主任，现在又做了同事，大家认识，算起来已经有十七个年头了。他先后送给我的著作近十本，其中我知道他尤其重视《中国新文学整体观》，这是他全面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最初的收获（此前还有和李辉合著的单个作家研究即《巴金论稿》），学术品格也由此奠定。以后所出各书，或谈现代，或论当前，或重写文学史，或探索知识分子道路，都可说发端于此。我得到这本书也有十多年了，虽然经常翻阅——有时只是看看，有时因为正在思考某个问题，忽然想到他已经谈过，便找来参考——但从未打算关于它专门说些什么。这大概便是先儒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吧。

我读大学时，适逢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即将发生重大转变但实际转变又尚未到来的微妙关口，大学课堂里，学生对这门将变而未变的课程的忍受，则快要接近临界点了。现代文学史为中文系必修课，老师是极负责任的，但其授课实在不能引起我的兴趣。契诃夫小说《没意思的故事》形容课堂沉闷，说一只苍蝇飞进来，也会闷死的。我就在这种气氛中听现代文学史课，一年下来，毫无收获，本科毕业时

遂断定自己和现代文学无缘,决定“搞理论”了。如果没有思和师等“第五代批评家”,如果不是他们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既刷新了一门学科,又波及并深深影响当代中国人文学科许多其他方面,我至今或许还在那儿“理论”罢。《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对青年学生挣脱教科书束缚,换一种全新的眼光去接触文学史实体,有解放发蒙之功。要我讲它当时或以后的意义,我想说意义首先就在这里。

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性质,确实反映在大学教科书和沉闷的课堂气氛中。新中国成立后,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编史,通过编史以确立新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与绝对权威。文学史正是这种编史工作的一部分,教化的目的决定了其全部工作无法超越教科书式的“宏大叙事”。只从政治利益出发叙述文学发展,而不是追求文学史本来面貌的完整呈现,这种偏向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尤其严重。

由于历史的机缘,“第五代批评家”被推到冲破这种教科书式文学史框架的前沿。他们首先否定人为的“当代”“现代”划界,进而拆除现当代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和西方影响的障壁,填平大陆和台港澳地区文学的鸿沟,提倡“打通”,即把“五四”至今的文学在时空上视为整体,找出其间真实的发展脉络。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集中体现了这种新的文学史观念,全书十个部分(其实是十篇长文),谈论的都是从“五四”到当代贯穿性的文学问题。对此,作者在《后记》中有这样的解说:

新时期文学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文学创作方面所达到的成就,不仅远远超越了十七年文学的水平,在总体

上也已接近、甚至在局部已经超出了“五四”新文学的水平。但是新时期文学的产生又决非偶然，表面上，它是从“四人帮”所造成的文学废墟上生成的，从更为内在的意义上说，它始终没有离开过自“五四”开始的新文学的传统。诚如艾略特所说的，“一种新艺术作品之产生，同时也是以前所有的一切艺术作品之变态的复生”。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中每一次对既有成就的突破，除了有横向的外国文学的借鉴以外，常常又是过去被“左”的路线所压制的“五四”文学传统的“变态的复生”。我们从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身上看到了阿Q的影子，从张洁小说的女性形象中读出了莎菲女士，王蒙等人的意识流小说、舒婷等人的朦胧诗，以至最近活跃文坛的“文化寻根热”，几乎都能够在文学史上找到其源流。这决非为了证明文学史上“古已有之”的光荣，也决非抹煞我的同辈人探索的创新意义，它只是告诉人们，今天的探索并没有割断历史，也不是什么旁门左道的野狐禅。它是文学发展的一种正常反映，是对前人未竟的探索的继承和发展。

这只是对他的工作的简略说明。全书关于具体问题左右逢源点面结合的许多精彩论述，比一些基本的理论概括，像“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两种启蒙”等，要更丰富更细密得多。但基本想法，确实就包含在这段简略的说明里。

北京的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三位将打通后的研究对象称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和师则根据自己的体会，提出“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一以时间标识，一则沿用既有的学术概念，即从和本世纪中国文学攸切相关的现代白话文中拣出

使用频率极高的“新”字来命名。表面上,大家都强调整体研究,似乎无甚差别,其实是有所不同的。这不同越到后来变得越清晰了。简单地说,前者着重廓清文学史外围各种人为界限,竭力扩张研究领域,后者则以更具历史性的语感,提示其所关注的重心,乃是打通之后文学史整体框架中“新”形态亦即现代性的社会意识与个体精神之流变。或者说,前者更倾向于鼓励文学史外部研究,后者强调的是文学史内部研究(我并不按韦勒克的定义使用“内部”“外部”概念)。前者设想一种无限放大的文学史,其逻辑的必然,是要推出无所不研无所不究或为研而研为究而究的纯学术的文学史。这显然是一种理想状态的历史学图景。后者的目的,却只想抓住他认为首先最应该抓住的文学中所表现的现代性精神意识的主干,“直指本心”,因而其研究工作在范围上反而是有限的,即更加内敛的。这从《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十篇论文的选题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最初的“打通”着眼于政治界限,这好理解。但界限不只在在外,而已深入人心,实非简单的时间隔阂,所以并不那么容易仅仅通过拉长时限来“打通”。“二十世纪”作为单纯时间概念,并不利于标识虽然其主体确实发生于这个时间阶段然而其根源与影响绝非刚好始于本世纪之始而终于本世纪之终的文学史实体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十九世纪以前中国文学的差距,尚可作此截然划分(当然仍旧有许多讲不通的地方),可到了二十一世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难道就马上自动取消或转变了吗?随着新世纪脚步的逼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确实已经日益显出尴尬来了。



更重要的是,如果不从内部,不从文学所反映的精神意识的主干着眼,单在时间上“打通”,很可能又只是呼应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从而造成又一种被动呆板的学术,本质上仍然和以自由为最高理念的文学无缘。

政治视界对文学的干扰,因为蒙了新观念新方法之名,甚至比过去走得更远。比如有一段时间,为破除文学史对“五四”传统的简单化叙述,排他性的所谓从鲁迅至左联的发展主线有意按下不表,大家转而竭力搜求已往被忽略的作家作品。先是海外发起的“沈从文热”、“钱钟书热”、“张爱玲热”,种种热点研究,确实“发现”了一个久被遗忘的文学天地。后来更细致了,周作人、废名、林语堂、梁实秋、施蛰存、梁遇春、林徽音等,所谓“被鲁迅骂过”或与鲁迅文学圈子无关的人,纷纷“发掘”出来,有的甚至成为一时之显学。年轻的研究者只好往更底层深挖掘,小作家研究蔚然成风。但与此同时,所谓鲁迅传统本身倒被压缩到“鲁迅研究”专业领域,在重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呼声中,反而对它很少去做相当的重新“发现”与重新阐释的工作。事实上这项工作远没做好,更不用说已经完成。不仅如此,为了强调已往被压抑的文学,一些研究者想当然地将所谓从鲁迅到左联的主线虚构成历史上实有的压抑者,称之为“五四”以来的主流文学,而将“重新发现”的文学定位于主流以外。例如张爱玲的成就,据说就在于她成功地回避了喧嚣飞扬的主流,触及人生的底层,展示了个体生命的实感空间。进行这种论证时,张和“五四”无可抹煞的血缘关系就被撇在一边了。这样的研究不仅无法理解张氏小说特别是她后期作品激烈批判现实的态度和深刻广大的人类之怜悯,也无法说明作为整体的“五四”文学精神的丰富流变。凡

此种种,说明本来意在“打通”的文学史重写工作,因为只强调在时间空间上对原本残破的历史图景的拾遗补缺,强调对旧的文学史叙事的拨乱反正,忽视了与此同时对内在整体精神意识的沉潜含玩,照样有可能人为地造成文学史深层新的分裂和板块漂移(再比如许多研究者注重海派京派的分野而很少论及两者的相同或相通)。这或许是“以改革为胎,反抗为本”的一切思潮学术概难免除的弊端吧。

思和师在这种学术气氛中开始自己的研究,但他似乎一开始就意识到拨乱反正可能导致的过犹不及,所以在以“中国新文学中的……”为题的系列论文中,一再强调所论问题本身的开放性,一再申明自己仅仅是截取流动不居的历史长河的某一河段,某一支流,一再强调他的工作并非求大求全的“史的研究”,而仅仅是“史的批评”,是以批评的眼光,勾勒新文学整体精神的流变,所以他的研究,虽然都只取某个横截面,却真正能够让你顺着不同横截面与新文学整体精神意识的有机联系,由局部想象全体。例如,他不仅把“现实主义”、“现实战斗精神”和“现代反抗意识”单列上中下三篇,组为一题,以示重视,其他各篇重点叙述某一贯穿性文学思潮,也时时可见与上述三篇的内在联系。因为密切关注了各种思潮内部的复杂构成,所以更有说服力地显示出不同思潮间盘根错节的整体性关联。他努力彰显的是“五四”至当代文学对相似乃至相同问题既有差异性又深具同一性的应对策略(“整体观”“共名与无名”用意即在于此),绝不人为地再搞什么划疆而治,自我封闭。往往一篇文章,就带动我们对本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全过程的思考。

这样做的前提,是始终紧扣文学本身,并非无所不议,无

所不谈。他心目中的“重写文学史”，绝非单纯时间延伸，叙述量激增——此弊当时和现在均未引起足够注意——而是通过超越局限的整体观，切实把握被历史遮没的活泼跳跃的文学之心。《中国新文学发展中两种启蒙传统》关于“启蒙的文学”与“文学的启蒙”之区分，是这种研究取向在理论上的一种自觉。强调文学研究的中心是文学，是文学所展示的心灵史，这也是对中国新文学发展中实际包含的有关文学本质的自觉的再自觉。类似意见，在他后来关于比较文学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王国维、鲁迅比较诸文中，都有极到位的引申。研究文学，就是研究文学中反映的心的波动，“内部研究”的意思，首先就应该指这个罢。本来，拉长时限拓宽疆域，就是为了超越一偏之见，更充分地感受一时代情感想象诸形式，更有效地把握一时代的心灵史，以及它与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彼此作用关系。如若不能，则拓宽无效，拉长也无益。所以后来许多研究者上溯晚清直至古代，横向比较纵贯欧美，他反而兴趣不大了。他对比较文学方法的大胆质疑（即认为如果没有对心灵之间的沟通和激发的实际体会，无论比较研究，还是影响研究，落脚点都将很不牢靠），绝非逞臆而谈，除了因为在王国维、鲁迅、钱钟书等人那里找到了强有力的理据，更主要的，还是出于他作为文学史家对文学可贵的直觉。

1994年“人文精神”讨论得很热烈，记得某天，一个与此有关的小型聚会散后，我们沿着闹哄哄的乍浦路往回走，他突然说起，许多搞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人纷纷转向文化史思想史领域，这未必走得通。当时在路上，话题未能展开就滑过去了，但他的想法我大致知道的。他强调的是“重写文学史”不

能丢开文学，不能将文学史以新的名义再次降为其他研究的辅助工具。正像文学有其他意识形态不可替代的功能一样，文学研究也有其他人文科学研究所不能替代的长处。从文学史本身可以汲取在思想史文化史领域或许不容易汲取的精神资源，这，是他的确信，也是被《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以及他的众多同行类似的工作所证明了的。

七十年代末至今，中国的思想解放，中国人文乃至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始终从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获取最初的灵感和基于人心深处的力量支撑，这一不争的事实，现在却需要反复提醒，才能被健忘的人们所记起了。表面上，这好像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不被重视的悲哀，实际上，我宁愿将这看作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有可能在今后走向新的歧途的一个征兆。我真的很怀疑，一个对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缺乏应有的兴趣与敏感的人，是否还能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进行高质量的耕耘。

多年亦师亦友的交往，我对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学识之广博，驾驭材料之娴熟，甚至首先也不是许多人反复强调过的文字表达上的明快畅通，而是他始终能够保持独立的个人对文学清新质朴的敏感。为了依从最初的判断，他可以抛开运用自如的学术语言，直说其自信而模糊的印象。这好像有些拙直，实则体现了他冲破名词障、话语障的真正文学的冲动。

小而言之，这是对文学的固执；大而言之，是对生命对历史的虔诚。他始终避免对文学现象作简单化理解，总是力图展现其丰富复杂的原生态与差异面。看他论现实战斗精神、浪漫主义、忏悔意识与文化寻根意识诸篇，你可以感到表面的理性下面，喷涌着的是发自文学深处更具决定性的生命热情，

并非徒然用一根理性的丝线将散席流珍编织起来。历史叙述的动力,“史的批评”所追求的“整体观”,不是建筑学之设计安排,而是心心相印的豁然贯通。

他始终以最大热情,关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现实主义与现实战斗精神以及如他后来所说的现代反抗意识,将此视为新文学与现实之最高关联,亦即新文学的精神原点。但他深悉这一文学流向的复杂构成与命运遭际。所谓现实主义、现实战斗精神、现代反抗意识,就是他根据历史发展的脉络,对“五四”时期提出的“为人生”的文学总理念的差异化表述。所以,当有人将这一具有丰富差异面的文学总理念虚悬起来,作为先验标准或者什么“正宗”时,他首先意识到的是它有被孤立、僵化、绝对化的危险。他自己很少在批评中僵硬地将他心目中的新文学宝贵传统当做预定铁律,横扫一切,因为“战斗”“反抗”的传统并非排他性的。在“五四”一代人的意识中,“战斗”、“反抗”,有着非常深刻的哲学体认,比别的名词更具丰富的包容量,只不过愈往后,这种丰富性就愈显稀薄了,以至于“战斗”“反抗”的传统,就像学术批评领域另一个名词——批判——所指示的传统,至今还是一个有待分析的成问题的概念。思和师的工作,有许多就正是在于阐释这一文学传统在不同社会语境中的差异化表现,所以他对表面和此一传统距离甚远的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的探索实践,宁取宽容心理,客观地看他们做得怎样,再从中体会他们面对现实的态度。

关注某个崇高理念无限繁多的差异化呈现,我以为这正是文学史研究必须具备的一种文学的自觉。严格地说,这已不是“研究”,而是研究的外衣包裹着的深刻的批评精神。

他深入研究了浪漫主义所依据的个体自由理念与现代中国文化之本质性抵触。浪漫主义在中国的一再受挫,被他上升到心灵史的高度来把握。那篇长文最后对人类心灵必须拥有“亿万万个红太阳”的召唤,几乎和其理性隐忧一样强烈。吃透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本质,依此观察当代文学中的浪漫倾向,他的判断就显得比较客观了。

他一再论及新文学发展中的忏悔意识,对“忏悔的人”不等于“人的忏悔”相当警觉。他后来写过两篇专讲鲁迅“骂人”的随笔,认为其特色就是夹带着一股无可宣泄的怨气,似乎随口道出,却实在讲到了点子上。好人长久地忍受委屈,他要么郁郁而死,要么就默默将一切在心底化解,升华,从而有可能比一切的好更好,比一切的正义更正义;在长久的忍受中,好人比并无委屈的别人,更实际地站到了“此在”生存的根基上,更真切地聆听到以沉默的方式自远而近到来的良心的呼唤:这正是鲁迅“人的忏悔”所包含的非宗教的宗教情怀,是“五四”所谓“人的发现”在文学上结出的精神果实。所以,思和师对新时期文学中“忏悔的人”的遗憾,实际上就是批评当代文学中的人格退化现象,即日本伊藤虎丸氏所谓勇于正视身内身外的现实勇于承担一切的真正自觉的“个”的缺失。他后来推崇王安忆《叔叔的故事》,也是有感于敏锐泼辣的女作家对一代“忏悔的人”不留情面的责难深获我心。他并没有将这部才气勃发的中篇纳入有关“忏悔意识”的历史叙述框架,但超越名词的心理攸同,不更可贵吗?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写于1985至1986年。两年多时间连做八篇长文,对上下七十年文学史去芜而取精,删繁而存要,实属不易。各篇彼此呼应,相互补充,已初具一部毁弃旧

轨创制新范的文学史雏形(他站在“批评”的立场并不承认是在写文学史)。后来台湾出增订本,又有增补,原先的研究更丰富了。这还反映在1988年开始的编年体文集中(至今已出七本)。此类后续文章,有《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寻根意识》(1986)、《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1988)、《当代文学创作中的生存意识》(1990)、《当代文学中的颓废文化心理》(1991)、《民间的浮沉》(1994)、《民间的还原》(1994)、《试论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三种价值取向》(1993)、《共名与无名》(1996)等。另外关于新历史主义、七十年外来思潮通论、比较文学方法、编写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几个问题等文,也很重要。将他继《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后近十年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工作贯穿起来,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内在发展脉络,昭然若揭。他清理旧账开辟新境的气魄识力,独标一格,而集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素质于一身,真将“现代”“当代”浑然贯穿一气。后出的文章,我希望这次新版都能编进去,以见其思想之全,也便于读者省览,就不细讲了。

他近年倾力研究转型期知识分子三种价值取向以及民间问题,整体观式的研究更趋深化。对此学术界议论较多,似乎疑问也不少,这里不妨照我个人理解,略说几句。

《试论知识分子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从历史角度,即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转型的特定背景,考察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既然谈“转型”,就不得不说明原来那个“型”即知识分子传统价值规范是什么——他概括为“庙堂意识”。讲知识分子传统价值规范,都离不开中国哲学文化至高无上的概念即“道”。但何谓“道”,又人言言殊。这篇文章中心不是谈“道”,却与“道”有关。庙堂意识,就是他理解的知识分子传统之

“道”，其特点是知识者借世俗权威向社会推行自己的主张，同时君王也并非外在于知识分子所执之道的他者，而是这个道演化出来的世俗代言人，他不仅要体现道的意志，而且须接受有道之士监督教训，否则就会被判为无道的昏君、庸君或暴君。知识分子道统和君权相互依存，根据是同一个“道”，其世俗文化之象，就是“庙堂”。与之相对的是民间，即主流意识形态以外的生存世界，它当然不完全脱离庙堂，但也有相对独立性。有庙堂意识的知识者都具相当的民间意识，一旦不能在庙堂行道，即退而在民间守道。走通庙堂、道统和民间，出处用藏圆融若化，这是传统之“士”的理想。但中国二十世纪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结构都发生巨变，“庙堂”拆除，与之相联的知识分子道统以及庙堂的补充形式即民间，也都今非昔比，这就渐渐出现了介乎“庙堂”和“民间”的“广场”。“广场”是庙堂和民间的替代品或曰现代转型。某种程度上，“广场意识”也正说明传统知识者的旧梦尚未醒来。

这在1989年的《“五四”与当代》一文中已有所触及。现代思想学术的总趋势是抛弃传统，学习西方。“广场意识”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启蒙主义文化传统学来的近似于模仿伦敦海德公园的一种试验。他们幻想有个空旷无比的广场，可以俯瞰众生，向他们布道，在庙堂之外，不借助君权，单凭知识分子自身建立新的南面而王的位置。五四运动即现代知识分子在这条道路上第一次也是最辉煌的一次努力，这种努力正是建立在虚拟的广场意象上，所以根基不稳，注定要失败。近代欧洲文艺复兴，是在反抗中世纪教会压抑的同时继承并复兴西方传统文化精髓。文艺复兴创立的一套新价值体系，经几百年积累发展，才渐渐演化为思想领域的启蒙，再演



成政治大革命。欧洲人走了一条渐进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向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但其主要内容是打倒旧文化,不是为了复兴这个一开始就被宣判死刑的传统。从康梁变法到辛亥以至胡陈革命,传统固然也曾一再被提起,但都是为了替当下变革寻找依据,是片面的“请出亡灵”。中国现代文艺复兴的轨迹和它所模仿的西方原型恰好相反,这就不可能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创设一个真能安身立命的新传统,其政治文化实践,也因此而缺乏强有力的价值依托。本来进退有据的庙堂和民间又不再接纳,文化人这才特别迷恋虚妄的广场。虚妄的广场上,无人会追究你的知识价值,这就容易使文化人轻易以“知识分子”自许,获得空洞的自我满足感。广场上从来不缺乏激情的泛滥,这激情鼓舞着文化人,但也掩盖了他们在更本质的知识价值层面的无知。“广场意识”的问题就在于它颇能使文化人自欺欺人,最终导致知识—政治—民间彼此隔绝互不沟通的分裂局面。

因此今天首先必须认清知识分子的价值到底何在,然后确立自己的岗位,发挥所能发挥也应该发挥的作用。这是从虚妄的广场撤退出来以后唯一可做的事情。岗位意识,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的自我划界,即从广场激情中还原出本我。岗位首先指知识分子谋生职业,尤其指可以寄托他价值理想的一份工作。“五四”仅仅为知识分子延续了一个道义传统,当然有其可贵处,但不能停留在单纯的道德信念、人格力量或气魄承担上,而必须落实到普普通通的工作岗位。教育出版,尤其是当代社会知识分子的两个最有可为的经营领域。其次,岗位意识还包括知识分子更深的使命意识:维系文化传统的精脉。知识分子不止是简单的社会经济存在物,他还是